

■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 新诗的碑纪

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

■ 罗昌智 著

■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 新诗的碑纪

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

■ 罗昌智 著



浙江  
大学  
出版  
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 / 罗昌智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8-06438-5

I. 新... II. 罗... III. ①诗歌 - 文学评论 - 中国②诗人 - 作家评论 - 浙江省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794 号

## 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

罗昌智 著

---

责任编辑 石国华

文字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排 版 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工作室

印 刷 浙江中恒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40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438-5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 序

谢冕

浙江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素以“文化之邦”为国人称道。但就文学而论,20世纪新文学的“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一页。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浙江名家无数,群星闪耀,推导潮流,引领文坛,蔚然而成的“浙江现象”以及“浙江现象”的文学史意义引人瞩目。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两个中心是北京和上海。而在这两个文学中心,浙江作家的存在举足轻重。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浙江学人和作家汇聚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力。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与核心阵地的“一刊一校”——《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先后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的一半,而且,正因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新青年》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江人在领导新文化潮流中的分量。同时,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甚多。除周氏兄弟、钱玄同以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尹默三兄弟和马裕藻三兄弟。他们以一种挺立潮头的姿态,以先导性思想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施加着深层的影响。

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化,左翼文艺运动的浩大声势推动着新文学蓬勃发展,中国新文学的中心也由北京南移上海。其间,从五四过来的一代浙江作家,多数已适时调整文艺思想,把握文艺发展新趋向,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为实现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性

转化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许多浙江作家实际上担负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责任，加之又有一大批新的浙江左翼作家的加入，使得这一时期浙江作家的左翼倾向特别浓重，引领 1930 年代文学的特征也就特别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因文学中心南移，与上海邻近的地域亲缘关系促成浙江作家由“边缘”向“中心”位移，为造就更壮阔的作家队伍创造了条件。阵营庞大的浙江作家群中，左翼队伍里有鲁迅、茅盾这样的大师，也有冯雪峰、夏衍、柔石、朱镜我、巴人、楼适夷、徐懋庸这样的文学骨干，而“新月派”的徐志摩、陈梦家，“现代派”的戴望舒、施蛰存等，也是此时的文学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可以说，1930 年代的上海，成了浙江作家的上海。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程中，浙江作家演绎了一段奇迹。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冯雪峰、夏衍、艾青、丰子恺、夏丏尊、戴望舒、施蛰存、巴人等等，一时多少豪杰，几乎占据了新文学的半壁江山。他们创立社团，领军流派，革新文体，建构理论，主导思潮，使整个新文学潮起潮涌。

从文学社团看，浙江作家在新文学中始终处在领袖地位。作为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 12 位发起人中，就有周作人、沈雁冰、蒋百里、朱希祖、孙伏园等 5 位浙江人。周作人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蒋百里是主席，浙江作家担负着实际领导者的角色。与文学研究会比肩而立的另一个重要社团是创造社。浙江作家郁达夫是其中力扛九鼎的人物，他不但是筹建创造社的“四巨头”之一，而且一直担任该社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的主要编辑工作，还为该社拟定了宣言书。语丝社是五四落潮以后登上新文坛的，这个社团的“浙江色彩”特别浓重。因为无论是其发起人，还是《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者，多半是浙江人。最重要的浙江“语丝”作家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章廷谦等，而周氏兄弟则被称为“语丝派”的“主将”。新月社作为提倡唯美主义的新文学社团，浙江作家所占的比例不高，但介入其中的两位浙江作家——徐志摩和陈梦家，在该社中所处的位置却十分显要。徐志摩是新月派的创始人之一，又主持该社的刊

物《诗镌》、《新月》，系统宣传新月社的文学主张，是新月社的组织者和引领者；陈梦家是后期新月社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人，在新月青年诗人群中独领风骚。

从文体来看，浙江作家亦多是一种或多种文体的领衔人物与创立者。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引领中国现代小说的意义自不待说。同时，由鲁迅领衔，浙东乡土作家群创立了“乡土小说”派。五四小说中的另一个著名流派是以创造社作家为主干的浪漫抒情派，此派小说是从郁达夫的《沉沦》开始的。茅盾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重要功绩是开创和引领了1930年代一个重要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浙江作家领衔现代小说流派，还体现在现代主义小说新形式的探求上，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就是典型。这个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而后两位浙江作家则是骨干与中坚。1940年代还有一个注重艺术探索、表现浪漫情怀的“后期浪漫派”，可以纳入这个流派的作家人数不多，而有代表性的徐讦、无名氏二位都是浙江作家。中国新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浙江作家也表现不俗。《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语丝派”散文、风行一时的“白马湖”派散文、美幻绝伦的京派和海派散文，浙江作家都堪称领军人物。就戏剧文学来讲，首先是沈雁冰、陈大悲引领的“人生”派戏剧；其次是以宋春舫、徐讦为代表的“现代派”戏剧，而李叔同和夏衍这样的现代戏剧奠基人，毫无疑义地显示出浙江作家在现代戏剧创建上的开拓之功。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大多是在诗歌领域发端的。中国新诗，从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开始孕育，到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及浪漫主义诗潮兴起，经过20世纪20、30年代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拓展，至40年代渐趋成熟。其后又在革命化和浪漫化的回漩中缓慢前行，直到80、90年代，朦胧诗崛起，新生代诗潮涌现，其发展又有了新的景象。回望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艰难历程，浙江新诗人更可谓拓路先锋与诗坛领袖。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等浙江诗人早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时期就显示出整体实力，诞生于杭州的“湖畔诗派”则

以流派的方式在浙江本土出现，显示了浙江新诗人首创流派的意义。这个诗派的出现，除新诗流派的开创意义外，还以其独特的诗风显示出纯正的流派特色：即“专心致志做情诗”。浙江诗人更显著的意义表现在引领全国重要诗派上。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诗派是新月诗派。在这个诗人群体中，贯穿整个诗派前后期的徐志摩，其独特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所显示的流派代表性意义，使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月诗人”。此外，邵洵美、陈梦家、孙大雨等浙江诗人，也都是这个诗派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另一个重要诗派是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浙江诗人戴望舒，他是现代主义诗潮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他的理论和创作几乎规范了现代诗派的创作路径和走向，对现代主义诗潮的繁盛起到了其他诗人无法替代的作用。1940年代出现的两个重要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不但有浙江诗人参与，如“七月”中的艾青、冀汧，“九叶”中的穆旦、唐湜、袁可嘉。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两个诗派的领军人物恰恰是浙江诗人艾青和穆旦。艾青是“七月诗派”的主要引领者，“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绿原在后来的《白色花·序》中说过，“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由此可以印证艾青在这个诗派中的楷模作用。穆旦是公认的“九叶”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唐湜说他是“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的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跨越20世纪20、30年代而真正走向成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艺继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之后已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新文学发生期的五四前后，浙江作家都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这一突出的文学现象可以从多方面去探讨其成因与意义。从根本上讲，浙江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群体性”与“引领性”态势，先声夺人的气势和敏于世变的气质，源于一种深刻的传统根源，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一种“内源性自觉”。

北宋覆灭之后，中国的文化中心迁到了江南，而杭州无疑是江南的核心。“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一时间，浙江成为“财赋

地”、“人文薮”。南宋创立的“浙东学派”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的先河；延至明、清，王阳明的哲学与黄宗羲的史学在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的基础上，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浙江成为启蒙主义的策源地。启蒙思想的流传与承袭，在浙江直接培育了中国近代有重要影响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龚自珍等人，他们的思想学识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指出，中国自近代海禁大开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小传统”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大传统”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两者必构成尖锐冲突。在冲突中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浙江文化作为“小传统”的位移，在20世纪之初，汇聚成一股波澜壮阔的“浙江潮”。正如浙江人蒋百里在《浙江潮》“发刊词”中所言：“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20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乎？”《浙江潮》所寓示的文化精神一如滔滔汨汨的钱塘潮，推动浙江作家冲出旧的营垒，走向新的世界。五四时代，鲁迅首倡“立人”，周作人直呼“辟人荒”，都昭示着浙江文化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浙江作家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国文学进行现代转型的内源性传统。

当然，浙江作家的这种内源性自觉，与浙江地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浙江文化属于比较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恣肆汪洋与博大浩荡，造就了浙江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千百年来，浙江文化在发展流变之中，已形成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传统。浙江人敢于创新，锐意进取，不盲从权威，不墨守陈规，颇具冲决网罗、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这都影响到浙江作家的气质与文学创造。

罗昌智的著作——《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正是基于20世纪中国文学“浙江现象”发生的大背景，以中国新



诗的发生、发展为主线,考察浙江诗人群的新诗活动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关系,确认其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贡献和与之相应的地位,因而所做的研究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新诗诞生以降,对其现代化转型和现代性体征的研究成果斐然,堪称“显学”。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现了一批对浙江新诗人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这些成果,或从生平与文学创作历程的史传角度给予浙江新诗人整体的记录与评价;或从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学理论;或从诗人创作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或从诗人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贡献等方面对浙江新诗人进行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略有遗憾的是,学人大多偏重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整体和作家个案的研究。对一个地域,区域文化生态影响下的诗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诗歌活动及其与整个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则少有关注。罗昌智近年来有志于区域文学作家与中国文学整体状态的考察与研究,他在考察中发现,浙江诗人群在推进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极为精到的命题。

罗昌智在著作中,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了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浙江新诗人引领现代诗坛的文化因由,总结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现代转型的贡献;又从审美论的角度,评述浙江新诗人在新诗创作上的成就。以中国诗文化为背景,以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发展为典型环境,参照近现代西方诗文化审美体系,以浙江新诗人的诗学追求、审美创造为研究点,对主要诗人和流派的创作进行整体化、诗性化研究,归结出他们诗歌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与文体精神,并使之与中国新诗的整体框架相榫接。还从影响论的角度,讨论浙江诗人群对整个新诗现代化的辐射力。最后得出结论:浙江诗人群是中国新诗运动的主导者,是新诗流派与潮流的开拓者。浙江新诗人的诗学理论拓新了中国传统诗学,成为中国新诗现代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现代体式的创建、现代诗艺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这些结论,据于历史,明于梳理,因周密的分析而确凿可信。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著作,罗昌智的研究亦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作者考察的对象是浙江新诗人群体,书中的论证则偏于20世纪上半叶的浙江诗人,20世纪下半叶的浙江诗人涉猎不多,似有欠缺。同时,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应该是双向性、多侧面的,罗昌智的论证重在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上,负面影响特别是作为个体的浙江诗人在整个新诗方面的不足论说偏弱。好在学无止境,理论之树常青,期待着作者的研究有新的深入。

适逢罗昌智的著作——《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出版,应他之约,审读书稿,为他所取得的成绩备感高兴,特作此序。

2008年8月28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 目 录

引 论 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坐标上 .....	1
第一章 开启新诗之门:五四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的首创之功 .....	24
第一节 五四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草创 .....	25
第二节 鲁迅:为寂寞的诗坛“打边鼓” .....	35
第三节 周作人:五四白话新诗的拓路者 .....	60
第四节 刘大白:在新诗与旧诗之间 .....	86
第二章 “专心致志做情诗”:湖畔诗人对传统爱情诗的突破与超越 .....	99
第一节 “专心致志做情诗”:造中国爱情新诗的塔底 .....	101
第二节 突破与超越:湖畔诗人爱情诗的现代品格 .....	112
第三章 新诗的创格:新月派浙江诗人的现代诗美追求 .....	125
第一节 徐志摩:创造现代诗美的“新月”“盟主” .....	128
第二节 陈梦家:延伸中国新诗的诗美之路 .....	153
第三节 孙大雨:“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 .....	171

---

<b>第四章 锻造“纯诗”:现代派浙江诗人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b>	183
第一节 “现代”的狂飙:浙江诗人领衔“纯诗”运动	186
第二节 戴望舒: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最高整合者	202
第三节 施蛰存:现代诗派的理论旗帜与拓荒诗人	238
<b>第五章 新诗现代化:九叶派浙江诗人诗歌品格的先锋性</b>	252
第一节 自觉的浙江诗人:走向“新诗现代化”	252
第二节 穆旦:“路的创造者,无路的旅人”	267
第三节 唐湜:“一个唯美的现代诗人”	282
第四节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先驱	299
<b>第六章 真善美的统一:艾青等浙江诗人与现实主义新诗的造极</b>	320
第一节 浙江诗人群:在现实主义新诗的旅程中	321
第二节 殷夫:“别一世界”的红色鼓动诗人	330
第三节 艾青:“迷人”的现实主义“诗坛泰斗”	344
<b>参考文献</b>	362
<b>后 记</b>	366

## ■ 引 论

### 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坐标上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浙江文学占据着不可缺失的地位。有人认为，浙江作家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sup>①</sup> 严家炎先生就曾说过：“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sup>②</sup> 20 世纪，是浙江人的文学世纪。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冯雪峰、夏衍、艾青、戴望舒、梁实秋、施蛰存、殷夫、巴人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浙江作家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集体出演，并引领群伦，营造了浙江文学乃至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汉唐气象”。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浙江作家的“引领性”与“群体性”特征造就了他们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而回首 20 世纪中国新诗的进程，浙江诗人群（包括浙江籍与在浙江活动的诗人）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坐标上，其“引领性”与“群体性”特征则尤为显著。他们实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开路的先锋”，理论的大纛，创作的中坚，为中国新诗的创立与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不朽的功勋已经镌刻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碑记里。

从中国新诗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浙江诗人群对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功不可没。在 20 世纪的历次诗潮中，浙江新诗人都是领潮诗人，并

---

<sup>①</sup> 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至 1949 年这一段时间，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较为知名的浙江作家就多达 130 余人。参见陈坚主编：《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sup>②</sup> 严家炎：《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且参与了“中国新诗”众多流派的创建。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中不乏执新诗牛耳者。从中国新诗影响论的角度讨论，浙江诗人群对整个新诗现代化的辐射力更是超乎寻常。

## 一、“浙江潮”涌：浙江诗人群领衔中国新诗运动

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革新运动潮起潮涌，波澜壮阔。而当此之时，一本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刊物——《浙江潮》由浙江学人蒋百里、周作人等在日本创办发刊。《浙江潮》“发大声于海上”：“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20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乎？”<sup>①</sup>“浙江潮”涌，标示着勇为人先的浙江人急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沉的强烈意愿。正是这种强烈意愿的支撑，浙江人打开了一个属于浙江的文学世纪。浙江诗人群在20世纪的历次诗歌运动中，总能主导诗潮，领衔流派，积极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新诗，孕育于“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中的核心人物，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浙江学人夏曾佑以及文坛泰斗章太炎，启蒙诗人蒋智由、秋瑾等人，面对如云翻卷的时代骇浪，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革新诗潮。夏曾佑们不为古人所拘囿，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种追求“新理想”、“新意境”的文学主张，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诗界革命”关注时事，注重新学，为五四新诗最终摆脱两千多年封建道统的束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诗界革命”力举“心口合一”，“以文为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蜕变提供了借鉴。

中国新诗，草创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茅盾曾说：“在白话诗方面

<sup>①</sup> 蒋百里：《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17日。

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的,除了胡适之而外,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位。”<sup>①</sup>在茅盾所列出的“开路先锋”里,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都是浙江诗人,当然,这个时期的浙江作家鲁迅、刘大白,也包括茅盾自己,也都是新诗运动中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们以新诗理论的先导性和在新诗创作上锐进的态势迅速成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出类拔萃的群体。在中国诗歌脱胎换骨、蜕变求新的转型时期,正是这一群浙江诗人真正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大门。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核心有两个:一是提倡白话,二是主张“诗体大解放”。以白话新诗对代表着旧的语言方式的旧诗的冲决,对于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在这场革命中,浙江白话诗人群先声夺人。1917年1、2月间,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的口号。随即,鲁迅、沈尹默、俞平伯、钱玄同对胡适鼎力声援。尤其是刘大白,他在《旧诗新话》、《宋代白话文学的发展》等文中反复论证,诗不但应该是白话的,还应该是自由的。只有“贵族的文学”才是文言的,“出身卑贱”的人的文学自然就只有使用白话。反过来,也只有使用白话的文学才能为广大众所接受。正是鲁迅、刘大白们的鼎力声援,最终促成了“胡适体”的出现。“白话”的标志确定以后,新诗建设的进一步就是建立诗性规范。胡适就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诗体的大解放”,这是白话新诗的理论 and 创作纲领。早年致力于白话新诗倡导与创作的浙江诗人群,于此倾心非常。在诗论方面,俞平伯1919年3月出版了他的《白话诗三大条件》,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周作人在对新诗创作作出考察后,积极认同与推崇“不必押韵的新体诗”,即自由体新诗,为新诗的体式变革奠定了基础。

“异军突起”的爱情诗是五四新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杭州“湖畔诗人”则把爱情诗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五

<sup>①</sup> 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第8卷1号,1937年1月1日。

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湖畔诗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sup>①</sup>在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们专心致志吟唱爱情的诗篇中，由真挚的情感，活泼的形式，灵动的技巧，单纯、清新、淳朴的诗美所构成的独特审美风格，标志着爱情的抒写模式实现了现代性转换，标志着爱情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在古老的诗国——中国经历了千百年的凝练之后，到了1920年代焕发了新的生机，情诗的文体意义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龙泉明先生指出：湖畔诗人的爱情诗，通过歌咏自由恋爱，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以青春人格建立为标志的新道德。与中国传统的爱情诗相比较，湖畔爱情诗在诗质上终于突破了传统，并赋予了属于现代的人性内涵和社会内涵，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新旧爱情诗的分野。同时，因为中国新诗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互动中诞生的，注定了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既无法逃避横向的“外来”影响，也不可能隔绝纵向的“古典”制约，它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情诗艺术的双向选择中完成了自身的文体锻造，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情”与“形”两个层面对既有爱情诗的突破与超越，呈现出它作为五四时代的情诗所应具有的现代品格。<sup>②</sup>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彻底打破了旧诗的禁锢，完成了新诗的草创。但旧诗的秩序被打破以后，新诗面临的却是一种近于“无序的状态”、“无治的状态”。五四白话新诗暴露出来的形式粗陋、诗歌“散文化”、“诗不成为诗”等弊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创作的新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的放纵与直露、形式“绝端的自由”等缺失到了新月诗人那里，受到了格外关注。闻一多、徐志摩们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要求，肩负起规范新诗、重建诗体的历史使命。他们将作诗看做是“创造庄严的动作”，要求把诗从新旧之别的衡量标准中解放出来，确立衡量诗美的特殊规范，使诗对生活的表现方式更加艺术化。为此，他们开始了对白话诗与浪漫派诗的反拨，开始了新诗范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

① 汪静之：《回忆湖畔诗社》，《诗刊》1979年第7期。

② 参见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中,他们把“本质的醇正”、“情感的节制”、“格律的谨严”当做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三者的紧密联系和统一,构成了新月诗人们关于诗歌艺术规范化运动的实质内容,明显带有诗歌艺术的唯美倾向。追求新诗的形式美,使新诗朝着诗应有的方向进一步迈进。而在这个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群体中,一群浙江诗人——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方令孺等功不可没。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新格律诗运动的主将,同时也是这一派的“盟主”。他不但一直主持《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杂志和栏目,自始至终都是新格律诗运动这场被朱自清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主持者。徐志摩还将民族传统诗艺作为桥梁对西方诗学进行融合,体现出极具现代意义的艺术自觉精神。他鲜明地提出了新诗的“创格”论,并以其在诗歌中所做的“创格”实验,对新月派诗人和当时的诗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志摩在新诗规范化与创格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之成为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座界碑。

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sup>①</sup>。在新月诗人开辟的格律诗道路上,陈梦家“上承新格律诗派的余绪,下开现代诗风的先河”<sup>②</sup>,既传承了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早期诗人的主张,也适时匡正了新格律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一步扩展了中国新诗形式美的路径。陈梦家擅长吸收和借鉴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并将之有机融入新格律诗的创作中,有效提升了新诗的艺术审美品质,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向度延伸了中国新诗的诗美之路。

邵洵美、孙大雨也都是成就突出的新月诗人。陈梦家曾在《新月诗选·序言》里极言邵洵美诗的浓艳之美,肯定其在新诗艺术上作出的成功探索。在新月诗派热心创制新格律诗时,孙大雨在运用外国诗的韵律上有独到之处。他采用“商籁体”创作的诗歌,格律严谨,操纵裕如,为中国新诗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

① 赵罗蕤:《忆梦家》,《新文学史料》1979年3期。

② 吴家荣:《论陈梦家诗歌理论的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